

赛博格：人与机器的隐喻

陈 静^①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内容摘要】赛博格作为20世纪晚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不仅蕴涵着西方语境中人与机器、心灵与肉体等古老隐喻，同时也是控制论视角下对这些命题的一种重述，同时赛博格也为从当代的角度对这一古老命题进行反思提供了一种新的策略。

【关键词】赛博格；隐喻；控制论

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在其《生来赛博格——心灵、技术和人类智能的未来》一书中指出：“赛博格是20世纪晚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标志。它魔术般地变出人-机杂糅和肉体与电路实体混合的图像。”^②赛博格的强大来源于它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渊源。赛博格所力图说明和探讨的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它为一个古老命题在信息化技术发展所遭遇的独特境遇作出了具有多重维度的当代解答。它的魔幻则在于它用一个浓缩而成的新词填补了长久以来的语义空白，在广泛的运用中被赋予了多重复杂的语义内涵。作为一个标志，它表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一副图像，它所展现的是电子时代人类的新景观。作为一种隐喻，它以其所具有内在语义张力“重新描述”了人与技术、人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的关系。

^① 陈静，1980年生，女，甘肃天水人，文学博士，上海交大人文学院艺术研究院教师，主要从事于当代文化与美学研究。

^② Andy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一、人与机器：西方的古老隐喻

隐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成了西方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隐喻的四种形式中，类比是“最为受人欢迎”的一种。而这种隐喻“应当来自与原事物有固有关系的事物，但这种关系又不能太明显，就好像是在哲学中一样，只有眼光敏锐之人才能看出相距甚远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来。”^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隐喻必须在语义偏离的意义上成立，而这种语义的偏离源于原来的语义失效，在这个意义上就需要一个新的词语出现，来说明旧的词语，从而以这种方式创造了新的意义。而理查兹在后来则指出隐喻不仅仅是对于语言的修饰，而是帮助思维，“人类的认知能力就是植根于这种通过隐喻将两个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之中。”^② 库尔兹则进一步指出隐喻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为我们的概念系统带来新东西，并改善和扩展我们的概念系统。^③由此，隐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类比，到了对于思维认知的帮助，继而称为创造概念的新意义。隐喻填补了新概念与老概念之间的空白。这也是隐喻的创造力的体现，而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看来，隐喻不仅仅具有修辞学的意义，同时也是语义学和解释学的对象。他从一种认知方式出发对隐喻的历史进行了再认识，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类比的效果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浓缩的”过程。^④ 并指出，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认识到，“隐喻不是化装的胭脂，而是认识的工具，是明晰的东西而不是谜语。”因此，“隐喻的认识是对显示物的能动性的认识。……好的隐喻是那些表明处于运动中的文化的那些隐喻，是符号化过程的同样的能动性”。^⑤可以说，利科将隐喻的适用范围放大了文化中，隐喻再也无法退回到原来的修辞原点，从而具有了一种文化认知的功能。

从隐喻理论的角度，审视赛博格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我们就会发现，赛博格作为一种对人与机器、身体与心灵关系的表征，其历史和哲学的基础就是西方语境中人与机器、身体与心灵之间的隐喻关系的叙事。

自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来，人们就不断地以类比性的关系重述着人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力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190页。

② 冯晓虎：《隐喻：思维的基础》，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③ 同上，第34页。

④ [法] 保罗·利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⑤ 同上，第196—197页。

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的命题。笛卡尔在其当年未曾发表的《论人》和《论胎儿的形成》中都将人体看作机器，五脏六腑就如同钟表里的齿轮和发条，血液是动力。在其后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对肉体与灵魂进行区分时继续沿用了这个隐喻。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即使里边没有精神，也并不妨碍它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动作，这时它不是由意志指导，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① 肉体作为物质性的存在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可以感知，但同时，肉体与灵魂相区别的基础就在于肉体是上帝创造的像钟表一样的机器，健康的肉体 and 生病的肉体就是好的钟表和坏的钟表的区别，并不影响到灵魂的存在。

围绕笛卡尔对灵魂与肉体的区分，在西方观念史中形成了活力论和机械论两大对立阵营。活力论相信人类体内存在着的“活力火花”，可以将他们从动物和机器中分离出来，这种活力火花在不同的时代被描述为心灵、意识、理性或者创造性。而机械论则认为人与机器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人是机械的有机体，按照一定的法律和可遵守的原则工作。^② 这样一种灵魂和肉体二分对于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对于主体性的认知必须借助于一个外在的参照物，即机器或动物，才能将自身转为认知的对象，但同时，灵魂或者精神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对于这种认知起到一种决定性的意义，即决定了人与动物或者机器之间的区别。

在 20 世纪以来，这种论争有着向机械论发展的趋势，比如，法国哲学家乔治·冈格彦（Georges Canguilhem），就在 1947 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演讲《机械与有机体》中指出，“笛卡尔关于动物机器的理论是不能同他的‘我思故我在’相分离的”。冈格彦则认为，笛卡尔观点证明了一个声明的机械模式的结构合理性。笛卡尔想象是上帝而不是人，为人类的身体制造了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但是冈格彦则认为，这个看法过于简单，事实上，我们必须以生命为目的或前提，我们才可能按照这个目的去创造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冈格彦从一种神学与生命相融合的观点，认为心灵与身体无论是在机器还是在人之中都是不可分离的。由此，有学者认为冈格彦为后来出现的赛博格开启了理论研究上的先声。^③

① [法]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88—89 页。

② 参见 Sue Short, *Cyborg Cinema And Contemporary Subjectiv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35.

③ Ian Hacking, “Canguilhem Amid The Cyborgs”, *Economy and Society*, 1998 (2 & 3), p. 202.

而在二战以后，伴随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等人为代表的控制论的出现，人与机器、身体与心灵的类比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赛博格得以成为对这种关系的新的隐喻而被凸显出来。

二、控制论隐喻中赛博格

在维纳的控制论叙事中，人与机器之间的界线被抹除了，信息成为了将人与机器两个信息反馈回路联系起来甚至合为一体的基础。因为作为一种调节系统结构的跨学科研究，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信息的科学”^①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角度来重新审视并重构人，将之看作与动物、机器一样的信息系统。而这种信息化的过程被维纳视为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我们只能通过信息的研究和社会通讯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阐明在这些信息和通讯设备的未来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消息，势必要在社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②

对于诺伯特·维纳来说，身体与心灵的关系一直是他控制论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同时也充满矛盾的问题。维纳的控制论思想从技术的角度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甚至在海勒丝看来，“从维纳以降，通过反馈循环的信息流已经与自由的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联系起来……”^③由此，而赛博格作为一种“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zation），正是这种人-机边界抹除的隐喻意义上的体现。

但是，“自由的人本主义的价值——一种连贯的、理性的自我、自我对自律和自由的权力以及与对启发自我-兴趣的信念相关的能动性的感受都深刻地塑造了维纳的思想”。^④我们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可以看到，维纳尽管将人看作是机器一样都是通讯的机体，但是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观点

① 这是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一书的副标题，该书被视为控制论的奠基之作。

② [美] N.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8页。

③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2.

④ *Ibid.*, p. 86.

依然相信人具有的先天的学习能力使得人可以和机器区别开来。^①但是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更多的感觉到的是一种苍白和无力，因为如果一个控制论机器，在其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变得完全有意识和理性，那么这个机器是否应该被允许拥有自我？这样的疑问正是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试图在他一系列小说中所揭示的，计算机智能不仅赶上了人的智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人，因为他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更显示出“人性”，甚至还超越了人，控制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上面提到的机器人专家汉斯·摩拉维克则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已经致力于有朝一日可以将人类的意识“上传”到电脑软件系统中，从而将人类自身从必死的命运中解放出来。

与机械论狂热者相反的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回归的呼声。安迪·克拉克就将人与机器的关系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这是因为我们是天生赛博格，永远准备着将我们的心灵活动与笔、纸和电子的操作结合起来，我们以我们所为来理解这个世界”。外部工具对于人而言，不仅仅是外部支持物和辅助，同时也是人类智能——解决问题系统内部所必须的部分。因此“对人脑特殊的地方，以及对人类智能独一无二的特征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能够与非生理结构、支持物和辅助物形成深入、复杂的关系。然而，这种能力不能依赖于物理的/实体的电线-和-植入合并，甚至于依赖我们对信息-过程合并的开放性。”^②可以说，克拉克从一种后现代的技术语境出发重新阐释了“人作为工具制作者”（Man The Toolmaker）这一传统的论断。人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早已不再是人与工具的“使用”，而是主动地去寻找与这种非生物资源的亲密关系，人之所为人也正是因为这种主动的姿态和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形成的心理和观念。在此意义之上，赛博格并不是从20世纪“赛博格”这个词的出现，人与机器的杂糅过程才开始出现的。赛博格应该被视为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先天的”或者说“自然的”一种主体及生存状态。但克拉克并没有对这种后人类图景表示一种乐观的态度，相反，他认为如果单方面地去考虑人类与技术，人

① [美] N.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第44页。维纳写道，“人比其他生物优越之处就在于它具有生理上的因而也具有智力上的装备，使得他能够适应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人种之所以是强有力的，只是因为利用了天赋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可能性则是它的生理结构所提供的。”在该书第153页他又强调：“我讲的是机器，但不限于那些具有铜脑铁骨的机器。当个体人被用作基本成员来编织成一个社会时，如果他们不能恰如其分地作为负着责任的人，而只是作为齿轮、杠杆和连杆的话，那即使他们的原料是血是肉，实际上和金属并无什么区别。作为机器的一个元件来利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机器的一个元件。”在该书第83页，他承认：“我自己是持着自由主义的观点的”。

② Andy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6.

与机器所带来的扩展能力，而忽略人的心灵对于技术的“内化”过程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他试图在书中讨论的是关于人对自我的感知，以及人类内心的本质。^①在克拉克看来，赛博格作为人于机器的杂糅体，其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机器对身体的扩展，而是具有更内在的指向性，即人的心灵与身体，也即人的主体性问题。

可以说，对于人与机器的关系的认识或者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再认识与重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利奥塔意义上的元叙事的过程^②，一个尼采或德里达意义上的隐喻化的过程。^③在这样一个元叙事或隐喻化的过程中，人-机关系以及人的主体性也发生了不断的转移，并以一种隐喻化的叙事方式体现出来。当代赛博格的出现是该命题在20世纪科学与社会语境中的一个集中而突出的表征，同时也是这个不断再认识与重述过程的当代体现。

三、作为隐喻的赛博格

首先，赛博格作为一个浓缩而成的新词填补了长久以来的语义空白。而这个语义空白源于人与机器的关系。从笛卡尔开始，人是机器的命题就构成了一个隐喻。笛卡尔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将人的身体比喻为机器，就是以机器的方式来理解人，正如笛卡尔所说：“是我的思维把一个病人和一座做坏了的钟表拿来跟我关于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人做好的钟表的观念相比较，而且它绝不意味着任何存在于它所指的东西里的东西；相反，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自然（本性），我是指某种真实存在于那些东西里的东西，从而它并不是没有真实性的。”^④他以一种观念化的方式将人和钟表从客体转化为主体认知的对象，从而在主体性的认知中建立了两者的对应的类比关系。而对两者类比的基础就是一

① Andy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

②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将哲学称之为元话语，而将元话语求助于的对象称之为大叙事，认为正是这种包含了历史哲学的元叙事使得知识合法化。而对于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类似的声音，我们在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那里听到。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隐喻，新科学发现了自然自身使用的语言，科学事实上不存在方法问题，只是掌握新词汇问题，即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描述科学现象及问题的词汇。甚至，科学就是一套语义的网络系统。而方法是一种内在的联系性。同时，也没有“不带价值观”的社会科学。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客观性，词汇并不是事物内在本质的表述。语言是工具，知识是对实在的处理，一切的基础是伦理上的。

③ 尼采在《古修辞学描述》中提出“一切语言都是修辞”，真理是隐喻的凝留。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德里达的隐喻观，在《白色神话》中，他提出哲学文本是隐喻性的。

④ [法]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页。

样的内在运作机制。人的身体可以像钟表一样运作。而在此后的，无论是机械论还是活力论，都是承认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的身体和机器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类比关系，区别在于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维纳，他转换了这样一个类比的关系，认为人和机器一样是通讯的机体，构成的基础不是人或者机器，而是信息。如果说，从人到机器是第一层语义的转移，到了维纳这里，则发生了第三层的转换，即人和机器都是信息，从而弥合了人和机器之间的界线，信息成为两者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赛博格才能得以出现。而这也正是德里达意义上的“增补”，机器、有机体、动物、信息系统是作为增补存在，借助的都是前一个在场的缺席，即人的缺席。这种增补“作为代用品，它并非单纯地追加于存在的实物，它并不产生替换物，它的位置是靠空白的标记规定在结构中的。在某个地方，某物可以自动被填充补足，它能完善自己，仅仅……符号永远是事物本身的增补。”^①事实上，正因为对人自身的认识必须依赖于增补物的存在，赛博格，这个空穴来风的符号才得以存在，而其合法性即在于它以一个没有源头的新词抹除了身体与机器、心灵与肉体之间的界线，这种抹除的前提则是在信息填补了人与机器的隐喻关系中的空白之后。赛博格成为了新的人和机器关系的隐喻，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在后现代语境中人人都是赛博格。同时，赛博格作为一种命名，实际上包含了人是机器、人和机器都是信息这样一个内在的隐喻关系，但同时它也继承了两重隐喻所带来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

其次，赛博格所具有的多重意义上的建构性力量源于其内在的语义张力。利科在《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的地位，隐喻的最内在和最高的地位并不是名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不是话语，而是‘是’这个系动词。隐喻的‘是’既表示‘不是’又表示‘像’。”^②赛博格作为一种填补空白的隐喻的凝结物，之所以能具有多重意义上的建构性力量恰恰在于人与机器，人与机器与信息的隐喻关系中的“不是”与“像”之中。人是机器，但同时人又不是机器，其内在的隐喻关系是一种相似的“像”的关系，因此人可以用机器的运作机制来描述身体的运作，但同时这个“不是”又体现在人具有机器所不具有的灵魂或者活力或者创造性以及学习能力等。即使是在维纳的控制论里，人和机器都隐喻化为通讯的机体，但是人和机器同时又不是通讯的机体，其基础在于人具有机

① [法]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② [法]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家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页。

器所不具有的学习能力。因此即使在赛博格隐喻中，人和机器的界线已经被抹杀了，但是关于心灵和肉体的二元对立却一直在赛博格叙事中存在。回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现实的赛博格和隐喻的赛博格，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或者说个体的赛博格，事实上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说明了在现实人和机器之间的“像”的关系，通过技术的方式拉近了机器和人的关系，但是隐喻的或者说社会的及养成的赛博格中，这种人和机器之间的距离又被放大了。赛博格必须放在一个虚拟化，甚至可以说隐喻化的环境中去突出人的肉体所不具有的却是赛博格所独具的特性，这种“不是”则成为了赛博格叙事的一个增长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化叙事中对于赛博格的极端化塑造则成为可能，技术或者同样作为隐喻的“赛博空间”为赛博格的多重形象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赛博格自身与人的肉体之间的距离则为之提供了叙事的可能性。也因为这样，我们才得以看到在大众叙事中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赛博格形象。

第三，赛博格作为一种隐喻开启了一种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机器的关系的视角。利科在《活的隐喻》中还指出：“这一发现是：语言的创造性源于情节和模仿之间的联系。”而根据虚构与重新描述的这种关联，才得以发现隐喻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隐喻作为一种认识的工具，不断地启发我们对于事物或者概念本身的认识。可以说，从笛卡尔开始到维纳，他们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隐喻来表达自己对人-机关系的认识。而通过这种不断地重新描述，我们则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对人的主体性加以认识，不断地去接近真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以哈拉薇为例。她的赛博格神话，就是在一种既是真实又是隐喻，既是政治虚构又是神话的意义上使用了赛博格，在她那里，事实和小说之间的界线已经消失了，赛博格的力量就在于它是一种隐喻，它同时跨越了真实和虚拟的界线，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赛博格内在隐含的“不是”与“像”的关系。而哈拉薇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人与技术，特别是女性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一种重构，确定一种后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本体论政治。赛博格不仅提供了面向未来的神话，还具有一种反思性的力量。前文提到的克拉克的“生来就是赛博格”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而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两个方面的助力推动着赛博格的发展。一方面是人在日益网络化、电子化的现实空间中不断地延伸。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威廉·J. 米切尔在其三部曲之三——《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中就指出：“现在身体/城市的隐喻已经具体化和表面化了。植根于嵌入的边界和枝状网络的庞大结构之中，我的肌肉和骨架，生理系统和神经系统被人为地增强和延伸了。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无限制地延伸，

和其他人同样的延伸相互作用，形成了传递、刺激、感知、控制的全球系统。我的生理躯体与城市啮合，城市不仅成为我的网络化的感知系统的领地，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成为那个系统的空间和物质体现。”^①可以说，未来的赛博格甚至将会进一步地在虚拟和现实结合的新空间中弥合个体赛博格和社会赛博格之间的界线。而另一个方面的助力则来源于机器的智能化的发展，事实上从图灵时代开始，计算机就以智能化为其终极的目标，而短短的几十年间，计算机所取得的进展也已经是令人惊奇的，计算机智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一点上，赛博格隐喻中的机器一极所具有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也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与机器之间的张力就此会消失。事实上，赛博格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它将会在各种叙事中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被重构着。

(本文责任编辑：任天)

Cyborg: Metaphor of Human and Machine

Chen Jing

(Institut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coined word in late 20th century, Cyborg is a new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of human and machine, soul and body in western context. As a kind of metaphor, the emergence of Cyborg is based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human and machine since Descartes and the rethinking of the soul and bo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ybernetics theory. Cyborg re-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s of human and technology, human and machine and soul and body with the power of inner tension of semantics.

^① [美] 威廉·J. 米切尔：《我++——电子自我和互联城市》，刘小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